

文学史料研究·朱洪涛主持

# 胡适与广州中山大学

——从胡适一封佚信说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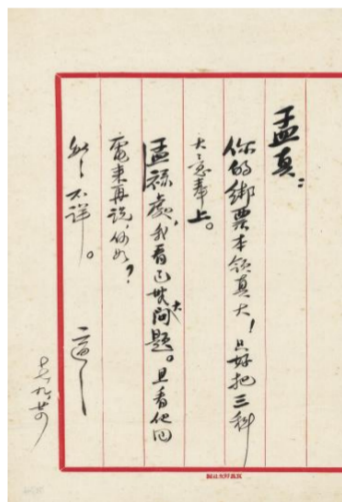
付祥喜

**摘要：**胡适与民国时期很多大学有过密切关系，其中包括中山大学。然而胡适与中山大学的具體关系并不清楚。一封新近发现的胡适致傅斯年佚信，为揭示这一关系提供了契机。据之勾连出 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底傅斯年三请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及胡适 1935 年广州之行践约失败的史实，既可爬梳、理清相关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也可明确胡适与广州中山大学的关系，增添一段中山大学校史，还可解开 1928 年 9 月 24 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谜团，确定一封长期以来被认为“具体月份不详”的傅斯年电文的撰写日期。

**关键词：**胡适；傅斯年；广州中山大学

胡适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、教育家，与当时很多大学有过密切关系，以至近年不少中国大陆高校以胡适作为学校名人作招生宣传，其中就有位于广州市的中山大学。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发现，胡适虽然是中山大学前身国立广东大学的三十五位筹备委员之一，曾数次计划赴广州中山大学，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胡适与中山大学的具體关系并不清楚，实际上他从未实地到过该校。一封新近发现的胡适致傅斯年的佚信，为揭示这一关系提供了契机。

2020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10 日举行的“中外名人手迹暨三宁斋旧藏专场”，拍卖一封胡适致傅斯年信（如右图）。



拍卖信件原件图

原件1页,“良晨好友社制”红色竖格稿纸,尺寸28cm×16cm,从笔迹来看,确实出自胡适。经核查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《胡适全集》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胡适纪念馆2018年出版的潘光哲主编《胡适全集:胡适中文书信集》等都没有收入此信。笔者检索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,也未见有人撰文予以披露。故而,这无疑是一封佚信。兹照抄如下:

孟真:

你的绑票本领真大!只好把三科大意奉上。

孟禄处,我看已无大问题。且看他回电来再说,如何?

匆匆,不详。

适之

十七,九,廿四。

信中提到两个人“孟真”和“孟禄”所指何人,这容易查考。“孟真”即傅斯年(1896—1950),初字梦簪,字孟真,山东聊城人,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教育家、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,早年就读于胡适任教的北京大学文科,系胡适学生,此后二人交往密切。孟禄(Paul Monroe, 1869—1947),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,美国现代教育家,1921年至1941年间多次访华,曾与胡适等中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,被推选为名誉董事,在由美籍和外籍人员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中,曾与胡适一起担任副董事长。

除了上述两个人名易于查考,这封短函中其余内容令局外人不知所云。胡适为何说傅斯年“绑票本领真大”?“三科”指的是什么?“孟禄处,我看已无大问题”,似乎指的是问题已大致解决,那么是什么问题?要回答这些问题,还得从探究此短函的写作背景着手。

胡适在信末标注“十七,九,廿四”,说明此信写于1928年9月24日。笔者检阅胡适写作此信前后一段时间的胡适日记、书信和傅斯年书信,予以梳理,由此揭开鲜为人知的胡适与广州中山大学<sup>①</sup>相关史实。

## 一、“盼望来此一次,演讲二三礼拜”

1926年冬,傅斯年从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,1927年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、文学院院长,兼任中国文学和历史学两系主任,同年,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任所长。受命之初,傅斯年深感迫切需要招揽人才,不但委托胡适推荐合适人选,而且邀请胡适赴粤。傅斯年在写于1927年下半年的一封信中,表达了这种迫切心情。

适之先生:

我现在生病,温度很高,自己不能写信,所以先托人写这一个短信。我到广州后,又忙又病,尚未曾写信,很觉着对不起。

请外国教员事,不知道请到了没有?现在预科的教员问题,倒是有法解决,只是英文系的教员太缺少了。我们向英国请两位教员去了,但是远水不及近渴,10月1号就要一律上课,不知道先生所检定的外国 Instructors<sup>②</sup>之中,有可以教本科学者否……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《经论藏》……陈又云,刚(钢)和泰将赴东京,希望我校寄彼千元,留其在京。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。何如使来广州,他可以助手带学生。我们可让他任意买书,薪水亦决不低,盼先生劝之。我返后与校中谈及先生,都盼望先生到此教书。先生此时恐怕不能就动身,但12月总盼望来此一次,演讲二三礼拜,并指导我们研究所。校中送先生来往川资及一个月的薪(毫洋五百元),如看的满意,肯留下,自然更是我

① 1927年成立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(广州)与国立第二中山大学(武昌)、国立第三中山大学(杭州)、国立第四中山大学(南京)、国立第五中山大学(开封)统称“国立中山大学”,后四个在1928年后更名,不再称中山大学。本文仅涉及国立第一中山大学(广州),且为区别于现今中国台湾地区的“国立中山大学”,故以广州中山大学称之。

② 教员。

们欢喜的了。<sup>①</sup>

此信没有标注写作日期,收入欧阳哲生主编的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系年为“1927年下半年”<sup>②</sup>。根据信中提供的信息,可进一步缩小其写作的时间范围。首先,傅斯年在信中说“10月1号就要一律上课”<sup>③</sup>,说明此信写于1927年10月之前。其次,傅斯年在信中转告胡适,他收到陈寅恪给自己的信,陈寅恪信中提到两件事:一是建议傅斯年筹款买《经论藏》孤本,二是要求傅斯年给自己的梵文老师钢和泰(Alexander von Staël-Hostein)一些经济上的资助。查《陈寅恪书信(422通)编年考释》,陈寅恪这封信写于1927年9月。<sup>④</sup>综合这两点,可断定上引傅斯年致胡适信写于1927年9月。此时,傅斯年正在为广州中山大学广泛聘请知名学者,如鲁迅、施存统、许德珩、容肇祖等。这年5月16日,傅斯年在致李石曾、吴稚晖的信中谈到聘请教授的动机:“我们又在这里筹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。既可免于受压迫,并开此地空气。已去请者,有马叔平、李玄伯、丁山、魏建功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李圣章、徐旭生、李润章诸先生。并请一切被压迫之同学来,筹三万元,以为贫学生之贷金,及来广川资。我们于大学日用省得无复加,且于此等事上大大破费一回。”<sup>⑤</sup>为了“免于受压迫,并开此地空气”,傅斯年等不但广揽人才,更舍得为此“大大破费”。相同的观念在上引致胡适信中亦有流露。病中托人写信,已表急切之情,又陈述托胡适寻找合适教员的紧迫,最后说,渴望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“演讲二三礼拜,并指导我们研究所”,甚至连“先生来往川资及一个月的薪”都准备好了,信末附言再次表达邀请的诚意。<sup>⑥</sup>

1927年5月底,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;6月,当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;7月,与徐志摩、潘光旦等创办新月书店;8月,与徐志摩等创办《新月》月刊。直到12月,胡适一直在上海写作和讲学。也就是说,接到傅斯年此信后,胡适虽繁忙,但并无固定教职,可他显然没有接受傅斯年的邀请赴广州中山大学。经查阅,1927年下半年,胡适没有就此事回复傅斯年的信件和日记。

## 二、“先生断乎不可不来之(十条)理由”

1928年4月3日,时任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(季陶)致信胡适,催促胡适赴广州:“前闻孟真兄云,先生已允于四月初旬买舟南下,今已及期,尚无登程确信,不胜劳想,谨再托孟真兄以函电促驾,并为专备行馆,务恳即时启程。”<sup>⑦</sup>这说明,胡适不但没有拒绝,还曾告诉傅斯年,自己预备在1928年“四月初旬买舟南下”。因“今已及期”,先是大中校长戴季陶亲自去信催促,接着是傅斯年在4月6日致信胡适,第二次邀请其赴广州中山大学。不过,第二次邀请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再三表达诚意,而是一方面排除胡适来粤的种种顾虑,另一方面列举“不可不来之(十条)理由”。摘录原信如下:

适之先生:

我们以前只发了一个电报,第二个电报我因几个“充足理由”,留下未发,只到最近才发了一个请先生急急忙忙马上来此地的电报,而信这竟是第一封,或者先生觉得奇怪。不过这道理非常明显,就是除非中大情形十分好,我们决不请先生来躬与其不盛!

中大本是毫无问题的,在校外实有不少的政治的力量,在校内学生对当局满意,一年来的进步,除非对我们有成见及有求未遂者外,总是看到些今昔不同。不过一群败类,如邵元冲、谢瀛洲、高元、翟俊千(三人皆所谓竞社中坚)等,太不自量力了,竟于骧先兄未返时,下了非做校长

①②③⑥ 傅斯年:《致胡适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50-51、51、50、51页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2003。以下引文皆据此版,不再具注。

④ 参见刘正、黄鸣著:《陈寅恪书信(422通)编年考释》,第27页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6。

⑤ 傅斯年:《致李石曾、吴稚晖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49页。

⑦ 戴传贤:《戴传贤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41页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3。以下引文皆据此版,不再具注。

不可之决心,于是什么手段都用了,结果他们自抹了一鼻子灰……总之,我等办事断乎不鲁莽,尤其不让先生感不快也。现在这些顾虑都全不成问题了,季陶先生回来,政治上撑起来,校内自可一如去夏贼军来临粤境前之积极进行。骝先至迟总是5月10日以前非回来不可的(其中有故)。故我们未曾先于此时之请先生,是因我们为万一之虑,此日之请乃并此万一之虑而亦无之也。先生断乎不可不来之理由:

一、我于去夏返后,即扬言先生将来,然尚未公然宣布。此次回来竟公然宣于校报,此间学生大喜过望,目前无日无人不来问我,先生究竟何日方能到。上月中,我无奈(当日骝先方走),还贴了一个告白,即用寄来短信为主料,加上些想当然的话,结论是“诸君于4月10日必能听到胡先生讲了”。如竟不来,使我下不来台事小,使先生于此间诸生心中失望,事乃大矣。

……

七、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,业已筹备,决非先生戏谓狡兔三窟,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,为中国而豪外国,必崑勉匍匐而赴之。现在不吹,我等自信两年之后,必有可观。然若干事件非先生不能举,领导工作非先生不能为,必有以来以成此事!

……

至于待遇问题,拟送来往川资大洋四百元外,每月照此间教员最高薪数大洋四百元(或毫洋五百)。少因无以便先生之行装,非我等之所安,多则此日中大,容非先生之乐受,故姑如此,未审何如(此数但就中大言)?

总之,先生来此,必有一阵大乐,千万勿使我等伤心!望收到此信时即日由大北或大东来一电,不特云来,并告行期。以便我践4月10日前之言。我除非万不得已,必至香港相迎,乞电船名(如小公司,并公司名),至盼至盼。<sup>①</sup>

已连续三次发电报邀请胡适赴该校,第二次电报被傅斯年扣住未发,其他两次却是发了的,内容大体是“请先生急急忙忙马上来此地”<sup>②</sup>。然而,三次发电报均以广州中山大学名义,如同公函,故傅斯年以私人身份写信给胡适,陈述“不可不来之(十条)理由”<sup>③</sup>。

傅斯年在信中向胡适报告“中大情形”时,多次提到的“骝先”即朱家骅。坊间流传朱家骅此时任广州中山大学代校长,此说既谬亦不谬。说其谬,是因为1927年7月中山大学改为校长制,戴季陶任校长(1926年6月至1930年9月),朱家骅任副校长(1930年9月任校长已是后话),而其间经亨颐曾短期任代校长(1926年8月至9月);<sup>④</sup>说其不谬,则是因为朱家骅深受戴季陶信任,中大事务均交由他处理,故朱家骅实行代校长之权。1927年12月10日,朱家骅赴杭州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厅长,同时兼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等职。于是,便有傅斯年信中所言“如邵元冲、谢瀛洲、高元、翟俊千(三人皆所谓竞社中坚)等,太不自量力了,竟于骝先兄未返时,下了非做校长不可之决心”<sup>⑤</sup>。为此,戴季陶从南昌返回广州,亲自主持中山大学事务,并过问聘请胡适来中大事宜,即傅斯年信中所言“(戴季陶)每以未得与先生一商之为憾(近两日尤频谈此)”<sup>⑥</sup>。

傅斯年这一封长信,先说广州中山大学情形,排除胡适顾虑,接着列举“不可不来之理由”<sup>⑦</sup>,许之以丰厚薪资,最后预定胡适赴中大行期,甚至连胡适赴粤时所带衣服、蚊帐等日常生活细节都考虑到了,不可谓不细致入微。虽然如此,傅斯年等来的却是“失望之至”<sup>⑧</sup>。

这年(1928年)5月15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说道:

适之先生:

奉电,不胜失望之至!前季陶先生

①②③⑤⑥⑦⑧ 傅斯年:《致胡适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55-57、55、55、55、56、55、64页。

④ 参见吕雅璐主编:《抗战烽火中的广州中山大学》,第293页,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2017。

据傅斯年信中说,在他写信之前,广州中山大学

及斯年长信所言,皆系实情,论未得复,甚以为怪,后始知赴庐山,然4月15日上海报已载先生新闻。今闻电,更盼稍以信示其概,以便对学生宣布也。“Solomney Promise”“皇天后土,实闻此言”!一笑。next year是否指下学期?冬学期(即下学期,最好11月初来)广州天气再好不过也……<sup>①</sup>

据信,胡适接到傅斯年那一封“不可不来之理由”<sup>②</sup>的信后,曾在5月初发电报,告知不能赴粤,故傅斯年“不胜失望之至”<sup>③</sup>。胡适此电文今已不存,无法从电文知晓其不赴广州中山大学的原因。不过,通过这一时期胡适写给江冬秀的信,可知此时胡适身体抱恙。他在1928年3月19日的信里说:“自从你走后,我没有好过一天。先是肚痛,后是头颈左边痛,后是喉痛,现在又是脚痛。”<sup>④</sup>胡适的儿子胡祖望也正生病,在4月1日、4月2日写给江冬秀的信里,他说及带祖望看病之事,决定带祖望一起去庐山养病。<sup>⑤</sup>4月4日,胡适父子与高梦旦、陈叔通等出发游庐山,12日返回上海。这也就是傅斯年信中提到的“始知赴庐山”<sup>⑥</sup>。5月3日,胡适在致江冬秀信里说:“我昨发一电给傅斯年,广东决定不去了……忙的要死,只有摆托〔脱〕一切外事再说。”<sup>⑦</sup>“我昨发一电给傅斯年”,即指5月2日胡适发给傅斯年一电报,这就是傅斯年信中提到的“奉电”。胡适的态度很明确,即“广东决定不去了”,原因是“忙的要死”。胡适当时确实很忙,遑论各种事务繁忙,仅就邀请他任职的就有好几家。据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,仅1928年初就有汤尔和“望兄北来”“先到津小住”,<sup>⑧</sup>又有丁文江邀请去大连讲学。<sup>⑨</sup>5月12日,胡适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:“南京的事,我去信辞职……广东也不去了。武汉方面也打电来请我去,也回掉了。”<sup>⑩</sup>

傅斯年信中的“Solomney Promise”“皇天后土,实闻此言”,<sup>⑪</sup>系引述胡适电文。前者指胡适对于赴广州中山大学的不确定的承诺,后者“皇天后土”指江冬秀,胡适以之暗示傅斯年,自己赴中大之事尚需与江冬秀商量。

胡适两次明确告诉江冬秀“广东决定不去了”<sup>⑫</sup>,傅斯年对此并不知情。他在5月15日致

胡适信里,虽然对胡适不能立即来中大表示很失望,但是没有绝望,其缘由很可能是胡适5月2日发给傅斯年的电报,没有明确拒绝,而是承诺说“next year”,以至较真的傅斯年追问:“next year是否指下学期?”并对胡适下学期赴广州中山大学表示赞同:“冬学期(即下学期,最好11月初来)广州天气再好不过也。”<sup>⑬</sup>

### 三、“先生之来,学生切望,同人切望”

对于要不要去广州中山大学,胡适其实心里犹豫、态度模糊。一方面,胡适两次在家信中表明不去广东的决心;另一方面,他既没有明确应允也没有回绝傅斯年的邀请,而是让对方失望之余,又留下希望。直到1928年秋,傅斯年仍抱有这种希望。他在8月15日写给胡适的信里提到一句:“最好置之不问,广州归后再说可也。”<sup>⑭</sup>第一句“最好置之不问”,乃是建议胡适对于辞去文化基金委员一事,最好先搁置不提。第二句“广州归后再说可也”,原信圈点,以示需要重点关注,其意思很明白,即建议胡适抵达广州后再决定是否辞去文化基金委员。这说明,直到此时,傅斯年仍然抱有很大希望。因此,1928年10月20日,他第三次正式邀请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:

适之先生:

信到,焦急万分,一为自己急,二为先生急。为先生急者,师兄有肺病,我们听到的也难过。为自己急者,先生之来,学生

①②③⑥⑪⑬⑭ 傅斯年:《致胡适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64、55、64、64、64、64、66页。

④⑤⑦⑩⑫ 胡适:《致江冬秀》,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23卷,第488、490-491、498、501、498页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。以下引文皆据此版,不再具注。

⑧ 汤尔和:《汤尔和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32页。

⑨ 丁文江:《丁文江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33页。

切望,同人切望。我因坚言必来者,如有转变,竟不能下台,无以对人,无以对自己的话,故昨晚也有想去的心思。目下颀刚闹得我心上颇发身世之思,昨晚益此不及眠矣。我一向作事非常顾面子(顾及而已),今若我说谎然,其不安可知也。

不过正以师兄的缘故可以即来广州。天气本不以疗病著名,但春秋之差,人间天上,10、11、12三个月,既不热不寒,又差不多不下雨(至多每月一次),故每月至少有28天之干燥(可询久居广州者)。目下同人均以为比北平好得多,如其干,无其寒,恰如北平阳八月天气,只不雨而已。每日暖日晴天,如在南欧。肺病所忌,一温,二寒(风俗),今两俱无之也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东山租得一房,其最上屋风景至佳,如在苑中。前临大江,有三角洲,背是白云山,四围皆园林田野。此时上山必暖者,然后可免伤风,上海无此等处所也。白云山自晋著名,中大造林于此。山寺可居,一切舒服。戴季陶在此,每居彼,故先生如愿携公子住山,白云山必甚佳(如住白云山,可以每周来城二日即足。当派一工人往为料理做饭)。亦可即住研究所上层,我必一切布置舒服。中大内科教授Bernauer,是原柏林大学病院内科上级医生(privatarzt),是甚有学问的人,我可以友谊的关系请其竭力诊治。诸如此类,恰合先生所要求。如有虚言,明神亟之!

牯岭莫干故甚寒,远不如广州之白云山,此时无改期之可能,因下学期天气实在不好,而次学年沧桑之变不可预知矣。广州值得一看也。

如真不能一气两个月,我中间必放你们走的。或者把材料给我,我续讲,或使学生自研究。但先生此时不开端,学期已去三分之一,学业之感不便颇大。开端之后,早点结束,固无可也。先生不必出去找事(如一切讲演,有求必应),可以甚闲,不至劳苦。乞信到即日命驾电示船名。至感至感!<sup>①</sup>

无法知晓具体内容,但通过傅斯年以上复信可知,总归是胡适以胡祖望的肺病为由而没有赴广州中山大学。傅斯年仍不放弃,先是说自己将承受说谎(上半年曾向中大师生承诺胡适来校)的舆论指责,乃至“昨晚也有想去的心思”(辞职离粤),接着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个方面依次细数“正以师兄的缘故可以即来广州”之理由。<sup>②</sup>天时即彼时广州气候适宜,适合胡祖望肺病,地利即广州白云山是“必甚佳”的居所,人和即“我可以友谊的关系”让中大内科教授Bernauer给胡祖望治病,甚至发誓说:“如有虚言,明神亟之!”<sup>③</sup>总之,“广州值得一看也”<sup>④</sup>。哪怕胡适不能来中大两个月时间,“我中间必放你们走”<sup>⑤</sup>,最后决然地请胡适尽快启程,“先生之来,学生切望,同人切望”<sup>⑥</sup>,企盼之心拳拳。

不仅于上述,《傅斯年全集》还收入一封傅斯年“八日”写给胡适的短函,编者谓“此信写于1928年,具体月份不详”<sup>⑦</sup>,摘抄如下:

今晚有人去广州,前谈讲单,此为最晚可能之送去,乞先生务于今晚7时以前派人送来,至荷至荷!此事在现在不复可与“皇天后土”商量也。一笑。至盼!至盼!

孟禄一电,最好还是拟一个,无论如何说,总以“了此”一段公案为快。因此是蔡先生个人之托也。<sup>⑧</sup>

首先,傅斯年在1928年某月8日致信胡适,请胡适当晚派人送讲单,以当年通讯条件,这只能是一封电文而非普通书信(从该短函无收信人称呼,亦可见);其次,由“与‘皇天后土’商量”<sup>⑨</sup>一语可推知,此信所谈内容与这年5月2日胡适发给傅斯年电文内容相关,那么,“讲单”应指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后的讲演清单。按照常理,傅斯年只可能在接到胡适电文后不长一段时间内记起并引述该电文,如5月15日信中引述“Solomney Promise”“皇天后土,实闻此言”。<sup>⑩</sup>据此推断,傅斯年此电文写于1928年

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傅斯年:《致胡适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74-75、74、75、75、75、74、76、76、64页。

“信到”指收到胡适来信,由于此信遗失,如今

5月之后不久的某月8日。电文中还谈到孟禄之事,而傅斯年致胡适信中首次提到“孟禄之事”<sup>①</sup>是一封写于8月15日的信,故推断该某月8日的电文写于8月15日之后不久。傅斯年特别交代:“此为最晚可能之送去。”<sup>②</sup>为何是“最晚可能”?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大冬学期开学在即。查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冬学期开学时间,即可初步断定电文拟于9月8日。然而,要坐实这个日期,尚需将此电文与本文开卷抄录的胡适佚信对照。比较二者,容易看出,前文所录胡适佚信是对傅斯年上述电文的复函:由于傅斯年连用“务(必)”“至荷至荷”“至盼至盼”等词恳请胡适当日派人送讲单,所以胡适在信中戏说“你的绑票本领真大”;“三科”指的自然就是“前谈讲单”,即之前两人谈及的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讲演的题目;“孟禄处,我看已无大问题”则是就傅斯年提议拟一个针对孟禄之事的电报以便“了此一段公案”而言。<sup>③</sup>看来,胡适接到傅斯年9月8日的电报后,直到9月24日才回信。

尽管胡适把“三科”讲单交给了傅斯年,人却没有去广州。个中原委,自然不是畏于“皇天后土”(江冬秀)那么简单。“1927年年中到1928年春,正是胡适处境最窘迫、心情最抑郁的一个时期。也可说是胡适一生思想的一个转变期,事业的一个转折期。”<sup>④</sup>1927年4月底,身在日本的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,劝他暂留日本,理由是他回国后将面临从政与否的选择及危险。<sup>⑤</sup>久留日本,不是长久之策。一帮朋友如徐志摩等人当时为避北京战乱,纷纷南下聚集上海,于是5月底胡适也抵沪,然而,何去何从,仍当深思。北京肯定是不能去了,其他大都市里面,只有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武汉是胡适当年比较可能选择的都市。事实上,这几个城市的友人都向他发出了邀请。也就是说,广州中山大学只是当年胡适的众多选择之一,并且不是良选。傅斯年在信中多次介绍广州和中山大学情形,显然是为了打消胡适的顾虑。可他始终没有明白乃师胡适没有赴中大,根本原因是他不但对南方“清党”的观感不佳,更反对国民党在中山大学采取的“党化教育”。胡适对南方“清党”的实际观感不佳,可从1927年夏天写给丁文江的

长函看出来。他在信中谈南方局势,情绪很差。丁氏遂写信给胡适劝解说,他自己“仍旧不悲观”,并劝胡适“大可不必‘忧国忧民’,徒然害自己身体。”<sup>⑥</sup>但胡适对地处南方的广州的“清党”仍然失望,何况他不认同国民党在中山大学等高校推行的“党化教育”。1927年10月,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请胡适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,胡适给蔡元培写信推辞说:“所谓‘党化教育’,我自问决不能附和。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,岂非‘枉寻’而求‘直尺’?”<sup>⑦</sup>碍于和傅斯年的师生关系,尤其其他对自己的热切期盼,胡适没有直接拒绝傅斯年的第一次赴粤邀请,可他在1928年4月16日答应出任中国公学校长,其实已表明取舍的态度。

1928年5月中旬,北伐军将进北京,中国的政治局势已基本确定。5月17日,胡适回顾自己归国一年究竟“做了一些什么事”,感觉“惭愧之至”,<sup>⑧</sup>表露出欲有所动的心态。南京、武汉等地友人邀请他去,都谢绝了。不过,他在日记中引述钱端升来信,“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”<sup>⑨</sup>,表明心有所动。本已欲有所动的胡适,此时接到傅斯年写于5月15日的第二次邀请赴广州中山大学的信后,先前“广东决定不去了”<sup>⑩</sup>的观念有所动摇。加上在6月15日南京

① 傅斯年信中谈及的“孟禄之事”,疑指中基会于1928年9月停止孟禄与郭秉文创办的华美协进社经费。当时胡适从杨杏佛处听闻,停止经费一事与颜惠庆有关,因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中基会董事,故而蔡元培委托胡适发一电报向孟禄作解释,胡适对此有些犹豫。

②③ 傅斯年:《致胡适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76页。

④ 韩石山:《学人素颜录》,第113页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9。

⑤ 参见顾颉刚:《顾颉刚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08-309页。

⑥ 丁文江:《丁文江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17页。

⑦ 胡适:《致蔡元培》,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23卷,第464页。

⑧⑨ 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31卷,第104页。

⑩ 胡适:《致江冬秀》,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23卷,第498页。

的大学委员会上,胡适被吴稚晖当面骂作“反革命”<sup>①</sup>,让他十分不快,会后写信给蔡元培辞职,宣布“此意十分坚决,绝无可挽回”<sup>②</sup>,虽有蔡元培再三写信挽留,最后还是辞职。此事标志着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,与国民党“党化”政策的尖锐冲突。在此情形下,胡适默认了傅斯年第二次盛情邀请,这给傅氏第三次发出邀请以信心。

顾颉刚对胡适的影响也需要提及。胡适和顾颉刚之间不是普通师生关系,顾颉刚称“胡适是我的引路人”<sup>③</sup>,而胡适对顾颉刚颇为器重。1927年3月1日和3月16日,顾颉刚接到傅斯年信,邀其往广州任中大史学系教授,顾颉刚表示同意,不久抵广州,直到1929年离粤赴北平任职燕京大学。顾颉刚在粤,恰是傅斯年三请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的这段时间,于是顾颉刚在粤的观感、体验对于胡适作出是否赴粤的决定,就显得十分重要。不幸的是,顾颉刚的观感和体验都很差。其一,广东政争、战事激烈,让顾颉刚有“不知命在何时”、不宜做学问之感。顾颉刚在1927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昨夜广州……城中与国民党军格斗,东山警署由工人缴械。屈园被抢,绍孟等损失均大。夜中长堤火光烛天,终夜枪炮声不绝。予与履安均彻夜不眠,真有‘不知命在何时’之感。”<sup>④</sup>周予同在致顾颉刚信里就广州时局纷乱感叹“学术运动恐非三十年后不易谈矣”<sup>⑤</sup>,顾颉刚以为然。其二,与傅斯年关系不睦。在粤期间,顾、傅之间摩擦不断,几近闹翻。这既缘于两人性格差异比较大,也有治学异趣方面的原因。对此,已有论者详述,<sup>⑥</sup>可资参考。顾颉刚鉴于自己对广州情形的观感和中山大学任职体验,多次劝阻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。1927年7月22日,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说:

粤中本有聘请先生之意,嗣以我去之后,为鲁迅攻击如此,恐先生去了更要引起他人误会,为一班不逞之徒攻击之标的,事遂作罢。我深愿让我们先去一年,俟根柢打好之后,再请先生去。<sup>⑦</sup>

顾颉刚建议胡适,先由他打前站,探探情况,“俟

根柢打好之后,再请先生去”<sup>⑧</sup>。此时,顾颉刚抵粤不久,对相关情况还不大了解,故而只建议胡适暂缓赴广州中山大学。待熟悉相关情况后,他一再劝阻胡适赴粤,并且陈述理由。顾颉刚甚至连胡适赴粤讲学,也极力劝阻。据1928年11月3日写给胡适的信,他的劝阻理由可总结为三点:第一,不要被“一班政客……利用为争权夺利的机会”;第二,“广东地方主义的发达,为全国之最”;第三,“先生这一次不来,我觉得虽使此间青年大失望,而省却一次风潮,也是好的”;第四,“闻孟真还是一定要请先生来,他未免把事情看作太简单了”<sup>⑨</sup>。

中大心理系教授汪敬熙在1928年7月25日写给胡适的信里,提到广州和中大情形:“(熙)在广州真是饱经变乱……广州日来甚热,此地熟人,如金甫、孟真,均已北上……颇觉寂寞。”<sup>⑩</sup>如此体验,估计对胡适也有一些负面影响。

除了上述,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胡适的顾忌。1928年5月17日晚,蔡元培与胡适细谈:

(蔡元培)问我肯不肯到广州中山大学做副校长。骧先现任浙江民政[厅]长,季陶又任广州政治分会事,故他要我去。我谢绝不能去,说了两个理由:第一是我现在决计开始做《哲学史》,不能做这样的事;

- ① 胡适:《致吴敬恒》,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23卷,第508页。
- ② 胡适:《致蔡元培》,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23卷,第509页。
- ③ 《“古史辨派”领军人物顾颉刚:“胡适是我的引路人”》,《新京报》2012年2月25日。
- ④ 顾颉刚:《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日记》(卷二),第111页,北京:中华书局,2010。
- ⑤ 周予同:《与顾颉刚书》,周予同原著,朱维铮编校:《群经通论》,第144页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2。
- ⑥ 参见朱洪涛:《顾颉刚、傅斯年与中山大学》,《粤海风》2015年第5期;刘召兴:《傅斯年、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》,《云梦学刊》2006年第6期。
- ⑦⑧⑨ 顾颉刚:《顾颉刚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16、316、356页。
- ⑩ 汪敬熙:《汪敬熙致胡适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:载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50-351页。

第二是季陶的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，恐怕不能长久合作。<sup>①</sup>

胡适说的第一个理由即由于“我现在决计开始做《哲学史》”<sup>②</sup>而不能赴广州中山大学，其依据可能来自顾颉刚对广州政局不稳、不宜做学问的观感。第二个理由才是胡适谢绝蔡元培邀请的真正原因。所谓“季陶的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”<sup>③</sup>，指戴季陶主张“清党”和“党化教育”，特别是中大在戴季陶亲信朱家骅主持下，成为国民党在高校推行“党化教育”的典型。这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，尤其自由教育观念相悖。当然，假如国民政府许之以中大校长，而不是必须与正校长戴季陶“合作”的副校长，则胡适也许会接受，但蔡元培大约不具备让戴让贤的能力。

#### 四、余波：1935年胡适广州之行 ——失败的践约

1934年12月20日，胡适写信告诉傅斯年，他决定29日南下赴香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，“（1935年1月）四日到港，九日到广州，约十二日到梧州”<sup>④</sup>。“这些地方都是我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。”<sup>⑤</sup>南下之前，胡适曾函告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康和史学系主任朱谦之，他将赴广州，“践昔年中大之约，拟作数次演讲”<sup>⑥</sup>。“践昔年中大之约”，指数年前胡适曾答应傅斯年赴广州中山大学讲演。经商量，胡适预计停留广州四天，在中山大学、岭南大学等地作10次演讲。就此而言，胡适1935年广州之行，可以说是当年傅斯年三请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的余波。起先，中大方面相当重视胡适来校演讲一事。“吴康请示校长邹鲁，决定由学校电请胡适来校讲演”<sup>⑦</sup>，不但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听讲，<sup>⑧</sup>教务长还奉校长令，紧急通知从文学院派四名助教届时负责记录。1月4日，胡适致函吴康，商议在中大和岭南大学演讲题目事宜，并告知“决定于一月八日晚十时坐船上省”<sup>⑨</sup>。9日上午7点，胡适乘船从香港抵达广州，吴康、朱谦之、陈达材等在码头迎接。胡适刚下榻广州新亚酒店，就有人捎来信，提醒他言行要“谨慎”。又

接到吴康捎来的一封信，说：“适晤邹海滨先生云：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，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，暂勿演讲，以免发生纠纷。”<sup>⑩</sup>“先生在港言论”，指胡适在香港演讲《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》时批评广东提倡复古读经。“快车离省”、仓皇逃走显然不是爱惜羽翼的胡适的选择，他后来说：“我既来了，并且是第一次来观光，颇不愿意就走开。”<sup>⑪</sup>为缓和广东当局对胡适的不满，陈达材引荐胡适拜访“南天王”陈济棠。然而，陈、胡话不投机，不欢而散，“他（陈济棠）似乎很生气”<sup>⑫</sup>。中大校长邹鲁的态度立即转变，在校内张贴布告，谩骂攻击“胡适认人作父…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”<sup>⑬</sup>；中大中文系主任古直等三人甚至联名致电广州军政当局，要求扣留胡适，将其“立正典刑，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”<sup>⑭</sup>；结果，胡适仅在广州游玩两天半，未作演讲就匆匆离开。胡适1935年广州之行，遂成为失败的践约。

在傅斯年三请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期间，胡适对广州情形和中山大学状况的了解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该校任职的两个学生，即傅斯年和顾颉刚。傅斯年是力主邀请胡适赴粤之人，他对广州和中大的叙述，难免偏于主观。比较而言，顾颉刚似乎相对客观。然而，事实是，广州于顾颉刚而言，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过渡之地。傅斯年说：“顾、杨诸君而下，均不觉广州之可久居，颉刚望北京以求狐死首丘。”<sup>⑮</sup>再加上在粤

①②③ 胡适著，季羨林主编：《胡适全集》第31卷，第108页。

④ 胡适：《致傅斯年》，胡适著，季羨林主编：《胡适全集》第24卷，第201页。

⑤⑩⑪⑫⑬ 胡适：《南游杂忆》，胡适著，季羨林主编：《胡适全集》第10卷，第453、462、462、463、471页。

⑥⑦⑧ 刘小云：《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：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（1926—1949）》，第171页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。以下引文皆据此版，不再具注。

⑨ 胡适：《致吴康》，胡适著，季羨林主编：《胡适全集》第24卷，第204—205页。

⑬ 《大学布告第七十九号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》1935年1月10日。转引自刘小云：《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：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（1926—1949）》，第173页。

⑮ 傅斯年：《致胡适》，傅斯年著，欧阳哲生主编：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，第56页。

的顾颉刚遭遇了与鲁迅的纠纷,与傅斯年又因性格、学术、行事风格之差异而频生龃龉,他对广州的观感和他的中大任职体验,其实很难做到客观陈述。顾颉刚的性格也使他遇事极易情绪化。他的学生赵贞信说顾的短处“在于理智不能胜过感情。故感情极易冲动,使所行之事未能恰当,被用之人无法对付。论者颇谓吾师既不能识人,又不能察势”<sup>①</sup>。胡适以顾颉刚之言为参考,难免有所误解和偏见。

当然,假设当年胡适应邀赴广州中山大学,其处境也很可能不佳。因为,胡适 1935 年广州之行成为一次失败的践约,其众所周知的原因,是胡适在香港批评广东复古读经引起广东政要严重不满,而深刻原因,却是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反对复古的西方文化思想之间的斗争。民国教育界复古之风蔚然于 1926 年。例如,1926 年 8 月 8 日,江苏省教育厅奉孙传芳函,通令禁止各校男女同校,禁用国语文;直隶省长褚玉璞特颁训令,自小学以上,一律添加读经、讲经;东北三省也主张读经;山东严令禁止白话文。<sup>②</sup>此后,虽经北伐军横扫北洋军阀而受到一定程度冲击,复古之风在一些省份仍不同程度存在。广东亦受此风影响。为“恢复固有道德”<sup>③</sup>,从思想上巩固对广东的统治,1932 年及之后数年里,陈济棠明令推行尊孔读经。广东复古之风虽然大涨,但是反对的声音并非没有。时任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清,就因反对读经而被免职。广州中山大学的复古派和反对派的斗争,集中体现在中大中文系内部读经派和反对派的争论。正方为中文系主任古直、教员钟应梅等,反方以副教授容肇祖为代表。在文学院院长吴康主持下,中文系通过了“读经”的课程安排。然而,当时就有人注意到,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,没有被纲常名教束缚身心,即使“四书五经”被列入课程,也不过是“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”,青年学生并未真心信服。<sup>④</sup>中大中文系学生在自办刊物上发表批评读经的文章,甚至散发反对读经的匿名传单,矛头直指古直。显然,胡适在香港批评广东复古读经,不但触犯了广东政要和中大校方时忌,更在不经意间卷入中大中文系内部复古派和反对派争论的漩涡。巧合的是,中大中文系反对复古读经的教师,都出身北

京大学,从理论上讲都是胡适的学生。而“北大派”长期在中大占据优势,也引致“非北大派”不满。前述古直、李沧萍、钟应梅联名要求广州军政当局法办胡适的通电,李沧萍实际上并未参与,事后古直和钟应梅发布启事称:“李沧萍……其实未尝与闻。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,则直等过矣。”<sup>⑤</sup>他们公然说李沧萍因属于“北大派”而不愿反对胡适。可见,当年胡适广州之行践约失败,也与中大中文系派系斗争有关。

此外,当日吴康两次送信给胡适,劝其立即离开广东,“以免发生纠纷”<sup>⑥</sup>,意在暗示胡适,继续居留广州,有性命之忧。中大中文系古直等三人的联名电文,已有要求广州军政当局诛杀胡适之语。据时任岭南大学教务长、参与接待胡适的陈荣捷回忆,陈济棠“极为残忍,任何人只要被怀疑不忠、是共产分子或与共产党有牵连,都会遭到枪杀。他甚至连小偷也枪毙。据说他每年要枪杀上千人。胡适的批评,当然会令陈济棠非常恼怒,广东省的大法官曾是胡适的同学,他感到很危险,就亲自到香港警告胡适不要去广州,因为可能会遭到谋杀”<sup>⑦</sup>。胡适虽未在广州被谋杀,但他放弃火车、改乘飞机赴广西梧州后,“后面的火车就发生了爆炸。据分析炸弹是埋藏好的”<sup>⑧</sup>。

历史不能假设,却能被叙述和铭记。傅斯年三请胡适赴广州中山大学,以及胡适 1935 年广州之行践约失败的史实,不该被遗忘。(下转第 124 页)

① 顾颉刚:《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书信集》(卷三),第 202 页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。

② 参见程栋、霍用灵、刘树勇主编:《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》第三卷,第 842 页,广州:广东旅游出版社,1999。

③ 童亮:《文化的反动:陈济棠与广东读经运动》,《深圳社会科学》2018 年第 2 期。

④ 唯如:《广东的复古运动能收效吗》,《清华周刊》1934 年第 3、4 期。

⑤ 《古直钟应梅启事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》1935 年 1 月 16 日。转引自刘小云:《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: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(1926—1949)》,第 175 页。

⑥ 胡适:《南游杂忆》,胡适著,季羨林主编:《胡适全集》第 10 卷,第 462 页。

⑦⑧ 华霁仁整理:《陈荣捷(1901—1994):一份口述自传的选录》,《中国文化》1997 年第十五、十六期。

代发展一直在推动知识更新。最近几年教育部陆续发布的新学科目录,如古典学、汉学与中国学、数字人文、创意写作等,我认为这些都将是文科未来的增长点。因此,即使在师范类院校,我一直保持乐观态度,对人工智能介入文科也是如此。我始终认为人工智能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,恰恰相反,它会成为我们“身体”的一部分,最终在人文教育中实现赛博格化,达到人机共舞的境界。

所以,文科的兴衰、文科教师面临的挑战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。我们真正的敌人并非人工智能,某些恐惧可能是子虚乌有。我反对在人类经验与人工智能之间直接构造人为的二元对立,或者简单套用“工具理性”批判

那一套陈词滥调来观察今天的人工智能。我更愿意借助人工智能,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,让人工智能成为文科的假肢或机体的内在构成。

**【作者简介】**彭玉平,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;蒋述卓,暨南大学党委原书记、文学院二级教授,汕头大学特聘教授;王立军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;张旭东,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、东亚系教授,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;张福贵,教育部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,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;朱国华,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学文化学院院长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;等等。

(上接第 57 页)遗憾的是,这段史实不仅当事人事后没有回忆、重提,后人也极少言及,即便有论者谈到,也是只言片语。如王汎森在《胡适与傅斯年》一文中说:“从 1927 年起傅斯年千方百计想请胡适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,但未成功。”<sup>①</sup>胡适传记、年谱则点到为止,例如:“为了扩大中山大学的影响,傅斯年极力希望胡适能来这里教书或讲演。”<sup>②</sup>有鉴于此,本文根据相关书信文献钩沉相关史实,有助于人们了解详情,明确胡适与广州中山大学关系,增添一段中山大学校史。至于借此解开了 1928 年 9 月 24 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谜团,确定一封长期以来被认为“具体月份不详”<sup>③</sup>的傅斯年电文拟写日期,则不失为意外收获。

**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理论研究”(21AZW017)阶段性成果。】**

**【作者简介】**付祥喜,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史、中国新诗、中国文学史学。

- 
- ① 王汎森:《胡适与傅斯年》,耿云志主编:《胡适研究丛刊》第三辑,第 221 页,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8。
  - ② 苏育生:《胡适左右》,第 208-209 页,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7。
  - ③ 傅斯年:《致胡适》,傅斯年著,欧阳哲生主编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,第 76 页。